

金冲及 著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



金冲及 著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金冲及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ISBN 7-208-03312-9

I. 二… II. 金… III. ①近代史—中国②现代史—中国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538 号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封面装帧 赵小卫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

金冲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75,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3312-9/K·784

定价 28.80 元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孙中山

目 录

引子	1
一、“黑云压城城欲摧”	3
二、推倒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10
三、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23
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41
五、“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58
六、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75
七、工农红军的苦斗	87
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6
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122
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37
十一、胜利快要来临的时候	151
十二、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	165
十三、民心向背的较量	183
十四、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209

十五、热气腾腾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227
十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38
十七、在新的探索中曲折前进(上)	250
十八、在新的探索中曲折前进(下)	275
十九、十年浩劫	292
二十、历史性的转折	307
二十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上)	327
二十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下)	344
二十三、走向新世纪(上)	360
二十四、走向新世纪(下)	373
二十五、百年历程的启示	393

引 子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动荡剧变的世纪,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世纪。这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几千年,是人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

对中国说来,这个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国家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濒临灭亡边缘,到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一百年。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本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中国的经济文化又那样落后,我们的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怎样从这种近乎绝望的境遇中摆脱出来,重新崛起,并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从黑暗中摸索前进。

在中华民族面前放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后者是人们憧憬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分作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的五十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就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一百年来,中国人走过的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在这中间,先后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每一次历史性巨变的到来都十分不易,并且经历过种种曲折。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所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要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去做。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中华民族的百年巨变,充分显示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蕴藏着何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会默默地忍受任何外来的压迫和欺凌。这个民族是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的,当它一旦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当它一旦有了正确的引路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就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来。

这本书准备简略地考察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从困境中奋起的历史进程。因为一九九九年还没有结束,本书的叙述只能写到一九九八年底。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充满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的历程吧,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一 “黑云压城城欲摧”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百年前的事情也许太遥远了。他们已很难真切地想象那时候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

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却落后了。当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蹒跚地走过了整整六十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使中国人痛切地感到自己这个国家已直接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威胁。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中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那样快地溃败了，虚幻的安全感突然消失。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一个省——台湾被割弃，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地被开放为商埠，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所有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还要向他们支付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三千万两是后来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回忆说：

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四川荣县）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铤）曾经痛哭不止。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①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第一篇《论世变之亟》劈头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②最后一篇是《救亡决论》。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痛苦地喊出“救亡”这个口号。它在以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成为中华民族行进过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主旋律。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

过了两年多，德国强行租借山东的胶州湾，又成为英、法、德、日、俄等列强争先恐后在中国攫取势力范围的新起点。占香港面积百分之九十的九龙新界，便是在这时候被英国强行租借的。在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报纸上，“瓜分中国”已成为经常的话题。这自然不能不更深地刺痛每个爱国者的心。严复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③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的演说中慷慨陈词：

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

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

①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955页。

② 《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1页。

③ 《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521页。

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道无他，只有发愤而已。^①

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走向高潮的。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紫禁城

翻开二十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悲惨的图画：一九〇〇年，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抗运动，英、俄、美、日、法、意、德、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进攻中国。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北

京，特许军队在北京公开抢劫三天，然后把北京城内划分为各国的占领区，强令居民分别悬挂各国的旗帜。他们的军队在中国的华北和东北，任意地屠杀民众，焚烧村庄。这种令人难熬的状况延续了整整一年，最后以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一段落。

中国便是在这种状况下进入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带给中国人的这第一份“见面礼”，对人们的刺激是极为强烈的。当时正在杭州读书的马叙伦在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39、240页。

前》中写道：当他听到首都北京失陷、清朝政府逃往西安的消息时，觉得天好像突然塌了下来似的，立刻放声大哭。九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还说到：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①

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四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并且创造过灿烂文明的民族。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对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产生过重大影响：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播推动了中世纪的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火药的发明使战争改变了面貌；指南针的发明使西方所说的“地理大发现”得以实现，也就是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内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既有负面的效应，也有正面的效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君子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在中国人头脑里一直留下深刻的印记。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Fairbank. John King)、赖肖尔(Reischauer)、克雷格(Craig)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的绪言中写道：“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

^①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7、358页。

族。”^①辉煌的过去同衰败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对照，使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生活格外觉得难堪，无法忍受。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有一个保卫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却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外的投降，并且屈辱到如此地步；内部腐败的充分暴露，使这个一向把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终于在人们心目中丧尽了尊严。

其中，最激起人们愤慨的是清政府的对外屈服。一九〇一年二月，当占领着北京的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颀颜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这以后，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利益，竭力镇压民众的反抗，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免都要看外国人的颜色行事。在中国内地，许多享有种种特权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为所欲为。各级地方官吏兢兢业业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②。

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

①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版，第 3 页。

② 《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势》，《新民丛报》第二十号，第 110 页。

起,毫不奇怪,人民大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之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

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①

“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朝政府这时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起过一点积极作用,却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立宪派曾寄托了很大期望的“预备立宪”,到头来只是一场骗局。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革命派斥之为“巩固君权之宪法大纲”,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条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②很清楚,这个宪法大纲颁布的目的是要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强化。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专制的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

①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7 月版,第 36 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 1958 年 12 月版,第 5979 页。

也没有了。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一旦看到中国的内外危机已深重到如此地步，昔日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状态都无法继续保持下去。

漫漫长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要生存，要独立，要发展，应该怎么办？在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做过了多种试验：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早已证明救不了中国；期望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义和团那种“扶清灭洋”的旧式反抗也救不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年的严峻现实又进一步教育了人们：中国人已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二、推倒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没有这种深刻的大背景,整个民族的觉醒是很难到来的。第二,还需要这个民族能看到新的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只要奋起救亡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着深重的危机,却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只是沉浸在一片悲愤和沮丧绝望的情绪中,那也谈不上出现民族的新觉醒。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第一个比较完整地给中国人指出一条新的出路的,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出身于一个由贫苦农民向华侨资本家转化的家庭。十二岁以后,长期在大陆和香港生活,并且接受了十多年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是最早取得在澳门和广州开业资格的外科医生。像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在

以往的中国社会里是没有的。

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夜,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出现过三次发展高潮。民族工业在上海、苏南、天津、武汉、珠江三角洲等地已有一定规模。张謇的大生纱厂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茂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跨行业的工业集团等,已开始形成。这种发展,不仅壮大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力量,而且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沿海沿江的一些通商城市)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些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方向,并且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政府的压迫,有着爱国和民主的思想。但他们在全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毕竟太小,力量相当软弱。它的上层,大多是从地主、官僚转化而来,同时还保有不少的封建田产,同官府往往也有密切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朝政府的态度。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不敢以激烈的手段来充当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于是,领导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客观上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本来应当由他们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群挑起来了。这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创立兴中会时,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宣言中宣布: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而且影响深远的口号,在这里第一次提了出来。可以这样说:孙中山一生的全部活动,都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出发点的。第二年春天,他同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时说: